

## 藏在“君子之道”与“生意之信”里的古代民法

范依畴

传统文化下的私法或民事法。这个民事法的规模庞大,成文的、不成文的都有,但要理清传统民事法的规范体系及相互关系很艰难。

如何认识这一规范体系?关键要查明中国人脑海中的“民事法印象”。历代百姓一般没有民事法的概念,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规则也记不住几条。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心中早已树立了传统民事法的四大价值支柱,即“做君子”(或曰“为仁人”)、“以直报”、“过日子”、“做生意”,这是中国传统民事秩序的四大基本支撑理念。

“做君子”(或曰“为仁人”),被视为传统民事主体的修养。它强调以“修身”即保全并弘扬“良知良能”的方式,培养民事秩序所需的适格主体。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出发,“为仁人”“做君子”并非只是有位者的任务,而是每个人的任务。这种以伦理素质和德行修养为核心的适格民事主体标准,与西方强调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权利代行和保障为核心的民事主体观念大不一样。

“以直报”,是支撑传统民事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每个人的最大义务是以适当方式回“报”(回应、报答)一切外来行径。孔子所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总原则。具体说来,首先是报恩父母和老师,此为“仁”的起点或基础(“亲亲仁也”“事师如父”);其次是报恩君国(“移孝作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再次是报恩天地,“参天

地赞化育”。除对天地君亲师五者(有恩于己者)应该“以德报”(报恩)之外,对其他身份大致平行者都应该“直报”——正当、正直、合理地回报。广义的“直报”,当然包括“报德”“报怨”两方面——对任何有恩于己者“以德报德”;对任何伤害、怨恨己者“以直报怨”。既然对“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父母仍可用“事父母几谏”(即委婉批评劝谏)的方式进行“直报”,对君王可以用“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方式进行“直报”,那么对施加不义于己的人进行“以直报怨”的回报(正常报复、追责、控告、制裁),就是天经地义了。这可以视为古人维护权益、处理纠纷的第一法则。直报,当然也包括为相关民事行为追索损害赔偿、追究违约责任等。

“过日子”,是支撑传统亲属继承的基本价值理念。过日子的要害在于“齐家”,就是以家或亲属关系为国家社会一切关系的模板或蓝本,关键是每个人在“家”和“国”(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家”)中扮演合于“礼”(“理”)的角色,履行作为成员在家或亲属关系中应尽的义务。“一切为了和睦过日子”的原则形成了传统民事规则的核心,要求每个人在家或亲属关系中“恪尽职守”“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恪尽为夫为妻、为父为子、为祖为孙、为兄为弟、为君为臣、为官为民的角色义务,就是理想的民事关系。在古人心目中,这些关系本质上都是“家人”关系,本无公私之分。他们心目中的所谓

民事关系,不是“人各维权”的关系,而是“人各尽职”的关系。

“做生意”,是传统家事之外百姓之间进行经济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这是讲在亲属关系外如何与他人(无先天伦理关系之人)互通有无、互相扶持的问题。主要与商事有关,但不仅指近代所谓的商事,也包括今日所谓民事的一部分。“做生意”其实最初也许是“做生意”,即做生活必需品和劳务的交易。“易”字原为“日”“月”二字合成,古人以日月之间的变换为易,后引申为交易,这可能超过近代以来所谓“民事”的概念。“生意(易)”的概念当然包括人与人相依生存、平等互助交易的意旨。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法则,“朋友有信”“民无信不立”,即诚实守信原则当然是第一法则。古代中国的商事观念以“互通有无”为本,“通”就是“仁”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具体体现,“通”体现了“互助”和“仁爱”。所以,古人认定“商为仁术”,而不仅仅以其为货殖生财之术。

这四个方面在儒学精神的统摄下,构成一个有机的价值理念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民事秩序与实际规则格局。这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理念、秩序、体系,与古希腊罗马至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事传统大为不同。唯有理解这种独具特质的“民法”形态,方能把握传统法律精神、洞察中西法治差异。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与之类似,元代的“冀秀贩卖干鱼案”同样体现了朝廷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的治理理念。元代不少商人在黄河附近收购大量鲜鱼运到各地销售,因当时储藏技术有限,鱼贩一般将鲜鱼用盐腌制,再运往各地出售。鱼贩冀秀和同伴购买鲜鱼后用亳州盐厂的盐腌制,然后运到山东销售。经过长芦仓时,当地盐务官员认为,冀秀等人的行为属于越界贩卖私盐,对其处以七十八两二钱的罚款。冀秀等人不服向上申诉,案件先后辗转地方盐务机构、中书省及户部。最终户部判定冀秀的行为属于正常商业活动,责令当地盐务机构退还罚款。

我国古代自西汉起实行盐铁官营,贩卖私盐属于法定重罪。但在“冀秀贩卖干鱼案”中,司法官在保护正常商业活动和打击贩卖私盐行为之间进行权衡时,展现出刑罚介入正常商业活动的慎重与克制。户部的判决不仅维护了冀秀等商人的合法权益,更体现了朝廷对商业活动合理性,以及商事交易安全的尊重与保护。即便在盐铁官营、严厉打击私盐贩卖的背景下,官府仍会根据具体案情,区分正常的商业行为与违法犯罪活动,避免过度干预市场。这与“奸牙吞本陪客案”中刑部对商业诚信的坚守一脉相承。

综上两起案件可见,古代商业活动虽受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但实际治理中,司法官常会依据法律和情理,对商业纠纷进行公正裁决,这既体现了朝廷对商业秩序的重视,也反映了司法官对商业活动价值的深刻理解。在处理纠纷时,他们不仅注重法律的适用,更兼顾价值和情理考量,力求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商业活动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黄宗羲所秉持的“天下之法”即为保障天下苍生福祉所立之法——

## 法泽苍生方为治世良策

李驰 杨孟莹

走抗清,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时局和腐败无能的政权,纵使一腔热血,也深感无力回天。

老年时,黄宗羲寄情学术,潜心著述。抗清失败后,他回到余姚老家开坛讲学,著书立说,写就《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孟子师说》等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历史学家侯外庐将其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的代表,认为其思想蕴含着现代政治中平等观念的萌芽。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最具现代法治启示意义。他在书中阐释了古代政治的核心概念,提出一套系统的国家治理方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宗羲十分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专设《原法》篇以阐明立法为民的道理。

黄宗羲认为,法是决定国家治乱兴替的根本。天下之治乱并不由其他因素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良法。三代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古代圣王关心民

据清代《成案汇编》卷十一《市廛》记载,雍正八年在贵州发生了一起布商因牙行拖欠布银讨要不得而在牙行自杀的案件。案件源于一起普通的商业委托,客商张陆士将一批布匹委托贵州当地的牙人(中间商)谢御克代售,双方约定布银四百三十五两,七个月后收账。然而一年过去了,谢御克始终未将货款交付张陆士。张陆士最终在焦灼与困境中选择了自尽。

案件上报后,贵州提刑按察使司初审后报请贵州巡抚,巡抚与中央刑部在案件定性上产生了分歧。贵州巡抚认为,谢御克虽拖欠货款,但原因在于下游铺户未及时支付货款,其本人并无直接侵吞布银的意图和行为,主张从轻发落。然而,刑部驳回了这一判决并作出改判。刑部指出,谢御克的行为是典型的“奸牙吞本陪客”,其长期拖欠客商本金的恶劣行径,是导致张陆士走投无路、愤而自尽的直接原因。最终,在刑部坚持下,谢御克被依照《大清律例》中“牙行诓骗货物累死客商”的规定,从重改判发往广西充军。

刑部的改判,清晰传递了朝廷以法律严厉打击商业失信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信号。刑部将谢御克的行为定性为“奸”,并施以充军重罚,意在守住商业诚信的底线,同时破除地方官僚对本地牙行的偏袒与维护,体现了朝廷对商业秩序的重视。这种重视并非简单的抑制或放任,而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商业行为,保障公平交易,促进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尽管古代存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但在处理具体商业纠纷时,并非无视乃至打压商人的正当权利,而是尽力秉持公正、公平原则维护商业活动的正常秩序,为商品跨区域流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在近代以前的商事交易中,牙人已有上千年历史。尤其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作为买卖中介

对促进市场交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些牙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垄断地位,控制市场甚至欺行霸市,侵害客商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维护市场秩序,朝廷制定了严苛的制度予以打击。例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余利,故高抬低估,以相亏害,及商販各以私债,通同牙行,共为奸计者,罪亦如之。”也就是说,买卖双方未达成合意时若有人强行把持市场,独占利益,以及商贩与牙行串通操纵价格,扰乱市场的,都要处以八十杖刑。早在宋代,朝廷就十分重视规范牙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嘉定二年,皇帝下诏命两浙转运司严明规定:牙人必须将客商贩运货物的交易信息详细登记在官方簿册上,如果牙人私自挪用、截留货物,或者进行赊销、转贩,导致货款拖欠、交易混乱的,官府将追究牙人的责任。这些规定均体现了朝廷对正当商业行为的保护。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但从“奸牙吞本陪客案”所展现的司法实践来看,也并非绝对。刑部对谢御克的重判,实际上是对商业活动中诚信原则的坚守与维护,体现了朝廷对商业秩序的重视。这种重视并非简单的抑制或放任,而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商业行为,保障公平交易,促进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尽管古代存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但在处理具体商业纠纷时,并非无视乃至打压商人的正当权利,而是尽力秉持公正、公平原则维护商业活动的正常秩序,为商品跨区域流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案说

古代朝廷如何保障商业秩序

『奸牙』吞货款、贩鱼遭误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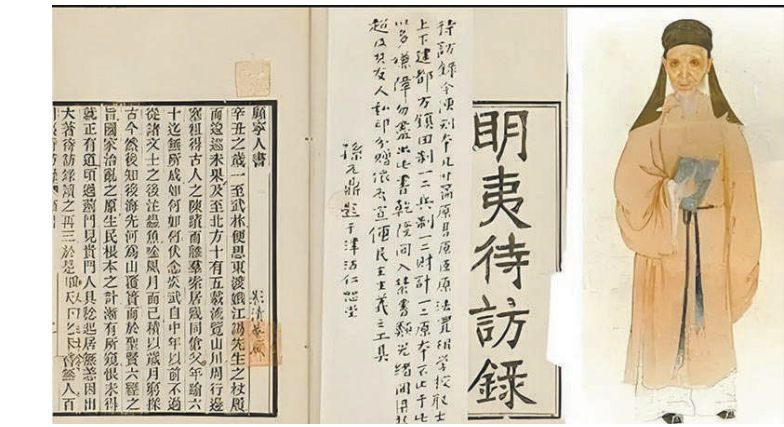
涂帅

## 人物

立法为民是中国古代立法思想的核心。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山人,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他目睹晚明政治腐败和明王朝覆灭。有感于乱世民生之艰、专制之弊,黄宗羲撰写了流传后世的不朽巨著《明夷待访录》。在该著作的《原法》篇中,他提出并阐释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天下”指天下苍生,“天下之法”就是为保障天下苍生福祉所立之法。

黄宗羲之所以提出立法为民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晚年在自题画像中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堕之于儒林。”少年为党人、中年作游侠,老年归儒林,这不但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立法为民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少年时,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民生困苦。虽世事混沌,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黄宗羲明辨是非,坚守道义,自幼就立志为天下苍生做一番事业。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曾与明代依附宦官权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势的官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不幸的是,黄宗羲17岁时,其父被阉党迫害致死。但他并未沉沦,在崇祯皇帝为其父平反冤案时,他当廷以铁锥刺伤杀父仇人,被世人赞誉为“姚江黄孝子”。可见,黄宗羲从小就有伸张正义的决心和勇气。

中年时,黄宗羲举兵抗清未果,最终灰心于政治。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北方政权陷落,福王朱由松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但弘光皇帝并未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而是整日声色大马,任用奸臣,南明政权继续腐败沉沦。黄宗羲为挽救危局四处奔



唐律清代刻本,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 《唐律疏议》何以成为世界法治瑰宝

杨静 曹玉

《唐律疏议》,原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人奉敕编撰的重要法典,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典。宋元时期因其为前代典章,多称《故唐律疏议》,元代后逐渐通称为现名,现存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苏书局刻本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作为中华法系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集前朝律典之精华,为后世律典之典范,堪称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璀璨瑰宝。

《唐律疏议》能成为承前启后的律作,领衔撰疏的长孙无忌厥功至伟。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军事贵族世家,生性聪慧,勤奋好学,博通文史,富有谋略。晋阳起兵后,长孙无忌即刻投身义军,南征北战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玄武门之变中,他运筹帷幄助力皇室定策,成为核心功臣。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24位有特殊功绩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首位。他始终忠诚尽职,辅佐稳固政权、革新体制,为唐朝建立与初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长孙无忌为人严谨公正,注重礼仪与法治,是主持《永徽律疏》编纂的最佳人选。唐初的主要立法《贞观律》始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历时十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完成,共十二篇、五百条,是唐律体系的基础。从内容上讲,《贞观律》将儒家思想深度融入法律条文,刑罚较前代显著宽缓,切实贯彻了轻刑思想。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颁布《永徽律》,条文基本沿用《贞观律》,仅作少量调整。但这部法典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条文简略又艰涩难懂,不同官员对同一律文的理解可能截然不同,易导致判决不统一,影响国家法制运转;二是唐朝科举设明法科,专门负责选拔法律人才,而《永徽律》缺乏统一权威的解释,使得明法科考试阅卷标准不一,影响选拔效果。

为此,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长孙无忌领衔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解释,时称撰写“律疏”。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修成《律疏》三十卷,与《永徽律》合编为《永徽律疏》,元代始通称为《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集中国法律思想与治理智慧之大成,作为承前启后的律典巅峰之作,它深化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唐律疏议》的内核。在立法技术上,《唐律疏议》凸显了对法律明确性和稳定性的追求。法律条文简明扼要,避免烦琐庞杂,便于官吏掌握和民众知晓。针对此前因各级官员对律文理解不同导致的量刑差异,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修律者为每条律文撰写了详尽的司法解释(即“疏”),通过“疏议”与律文并行的体例,实现法律“化天下不一为有一”的统一适用目标。其量刑原则既反对严刑峻法,也拒绝无原则纵纵,既保证了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又限制了司法官吏随意引法、舞文弄法的空间。总之,《唐律疏议》以“德主刑辅”为灵魂,以“一准乎礼”为骨架,以立法的清晰易知和司法的宽严适中,成就了其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法律价值与文明高度。

《唐律疏议》条文详尽、兼顾人情与法理,推动了中国法律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创造力和中国法制文明的深厚积淀。唐律在《法经》《秦律》《汉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等前代律典基础上“陈陈相因又有兴革”,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将律典编纂水平推向新高度。唐以后各朝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稍作增改,其影响力贯穿整个封建时代。

《唐律疏议》对周边国家亦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中华法系”就是指亚洲古代部分国家制定实施、核心精神与主体内容具有共同特征的法律群。具体而言,是以唐代法律为核心,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多国通过移植、借鉴唐代法律而建立的古代法律群。日本曾向隋唐学习国家制度和文化,模仿唐律编纂了《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安南(今越南等地)的古代法典“遵用唐宋旧制,但就宽简之间,时加斟酌”,黎氏王朝的《鸿德刑律》更是“参用隋唐”,并使“历代遵行,用为成宪”。

从世界范围看,《唐律疏议》在相当长时期内代表了世界立法技术与法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致同期,欧洲先后出现了《阿玛菲法典》(11世纪)、《奥列隆法典》(12世纪)、《康梭拉多法典》(13世纪)等,这些法典不仅成书晚于唐律,内容也较为简单。美国法学家威格摩尔曾指出,中华法系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存续的法系之一”,其成熟度与影响力在古代法制文明中独树一帜。放眼世界法制文明,罗马法是奴隶制法律的代表,《唐律疏议》则是封建制法典的典范。

《唐律疏议》凝聚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历代先贤能吏的卓越智慧,它将儒家“德礼为本”的精神内核注入法典,以“一准乎礼”为原则,创造性地实现了礼法深度融合。这种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戒有机结合的模式,生动诠释了中华法治文明独有的“礼法结合”治理智慧,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刑罚规则,成为引导民众向善的行为规范,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竭的法治富矿。

【作者分别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镇坪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校级项目《深入发掘中国法制史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研究(XJYZ2025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法,直言道:“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在黄宗羲看来,制定“天下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王都是具有恻隐、爱人之心立法者。他们懂得百姓的实际需要:百姓不能缺粮,就分地种田;百姓不能缺衣,就分地种桑麻;百姓需要教化,就设学校,让其接受教育;其他制度也都以保障民生为出发点。在黄宗羲看来,“天下之法”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良法,它能让百姓吃饱穿暖、受到教育,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可见,黄宗羲并未拘泥于一朝一代的政治得失,而是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领悟了国家若要繁荣富强,就必须依靠良法进行治理的道理。而所谓良法,正是以立法为民为原则所立之法。

当人们以现代法治视角回望古代法思想时,《明夷待访录》的前瞻性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其被视为中国古代极具进步意义的法学著作。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赞道:“《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诸篇,几夺卢梭《民约》之席;《原法》以下诸篇,亦厘然有法治之精神。”时至今日,黄宗羲的立法思想仍闪耀着光辉,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